

私德、师德与公德

——纪念唐圭璋先生120周年诞辰

■莫砺锋

应邀参加南京师大举办的纪念唐圭璋先生120周年诞辰大会,感慨良多。1984年10月我在南京大学博士毕业,唐老是我的答辩委员。当时唐老仔细审阅了我的学位论文,在肯定其优点的前提下,也指出了论文的不足与错误,使我获益匪浅。借用古人的说法,唐老是我的“座师”。可惜我一直局限于业师程千帆先生指定的唐宋诗研究方向,不敢涉足词学,未能进一步向唐老请益。我与唐老门下的诸位高足,如杨海明、钟振振、王兆鹏、刘寿明等皆谊如师兄弟,但对他们从事的词学研究则徒有羨鱼之情。唐老的学问在我眼中真如宫墙数仞,不敢妄置一言,我只想从德行的角度说说我对唐老的景仰。

古人称人生有三不朽,以立德为首。唐老之立德,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私德。唐老自幼孤苦,24岁人赘尹家,与妻子尹孝曾伉俪情深。可惜天公不作美,12年后尹夫人因病逝世,留下三个年幼的儿女。尹夫人临终前叮嘱唐老:他日再娶,切勿虐待三子。唐老回答:不再娶,不就亏待了吗?此时的唐老年方36岁,但他一诺千金,从此独身54年,直至90岁离世。唐老此举,不但今世罕见,就是在古代也难觅其匹。历代文人中颇有以悼亡诗词而著称者,潘岳、元稹之流人品有疵,姑且不论。即使与人品无瑕的那几位相比,唐老也毫无愧色。唐人韦应物与其妻元苹伉俪甚笃,元氏36岁病逝,留下三个未成年的儿女,最幼者不足周岁。韦应物伤心欲绝,其悼亡诗中“单居移时节,泣泪抚婴孩”“幼女复何知,时来庭下戏”等句,感人至深。当时韦应物40岁,从新近出土的《韦应物墓志》来看,他此后迄未续弦。唐人李商隐与其妻王氏也是一对恩爱夫妻,王氏卒后,李商隐写了多首感人的悼亡诗,终身未曾再娶。清人纳兰性德在妻卢氏卒后痛不欲生,其所作悼亡词,唐老在《纳兰容若评传》中评为“柔肠九转,凄然欲绝”。上述三人对亡妻之深情,皆有与唐老相类似

者。然而韦应物丧偶后独自生活了16年,李商隐独自生活了7年,时间都不太长。纳兰性德23岁丧妻,26岁续弦,31岁逝世,其忍受悼亡之痛的时间不足10年。相对而言,唐老对妻子的深情真可谓海枯石烂始终不渝。王安石咏杜甫画像说:“推公之心古亦少!”每当我看到唐老的遗像,心中也有同样的感受。本来丧偶之人再婚并非失德,男子丧偶并有幼儿需要抚养者续弦也是很正常的事。唐老的举动并非外在的道德要求所致,而是他对妻儿的真挚感情的自然流露,是用生命对一个庄严承诺的遵守。孟子说:“仁义礼智根于心。”此之谓也。我认为,深情绵邈、温柔敦厚的气质是唐老成为词学一代宗师的内在条件。

其次是师德。唐老是一代名师,终生都在教书育人。他从小学,中学一直教到大学,历任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南京大学、东北师大、南京师大等校教授,滋润树蕙,桃李满天下。唐老培养了一大批词学研究的优秀人才,唐门弟子在当代词学研究界已占半壁江山。更重要的是,唐老以自身的道德高标对弟子们进行了潜移默化的熏陶和引领,这也许是唐老最大的教育业绩,因为人格培养是教育的首要目标。对此,唐门高足均有深切的体会。杨海明说:“当我在高校工作多年,目睹了当今学术界的许许多多怪状之后,再回来回想唐师的为人和治学,就更觉得他人品之高和学风之正真乃当世所少见。”钟振振对唐老所讲的第一课记忆深刻:“这倒不仅仅是因为一群初学者第一次谛听一位全国第一流的词学专家讲授词学,更重要的是因为一位爱国的、忠于人民教育事业的老学者语重心长地教导子侄辈乃至侄孙辈的中青年学者应该怎样治学,如何做人。”王兆鹏说:“范洵老师三载,对唐师的人格风范有了更真切具体的感受。感受最深刻的,是唐师对人生事业的追求,十分执著,对学术,对爱情,都是矢志不渝。”唐老名震海内外,上闻求教或写信请益者不计其数。唐老几乎是有求必应,或耳提面命,或答书解惑,从不吝惜宝贵的

时间与精力。对此,许多学者都有亲切的记忆。吴新雷先生说:“唐圭璋先生对学生和蔼诚挚,循循善诱,有问必答,诲人不倦。”王水照先生说:“唐老儒雅温和、平易近人的长者风度是有口皆碑、世人共仰的。”刘乃昌先生说:“唐老为人热忱谦和,平易亲切,坦诚待人,笃于交谊,即使对后学也从不以先觉自居。”孔门四科,以德行为首。朱子论教,“以人伦为大”。唐老虽然未曾谈论这些话题,但他以身作则地贯彻了这些原则,他的一言一行都堪称当代的师德典范。

第三是公德。唐老是当代词学的奠基者,其学术成就嘉惠士林,沾溉一代。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在学术研究中体现出来的公心公德,学界交口赞颂。编纂一代文学总集,兹事体大而难成。清康熙朝编《全唐诗》时,已有胡震亨《唐音统笈》与李振宣《唐诗》的良好基础,仍由朝廷出面动员学者十余人,费时一年半方成。而且《全唐诗》疏漏错误甚多,重新编纂的工作从1992年开始,前后有五所大学的数十人参加,至今尚未完成。宋词的作品集总数虽然只有唐诗的五分之一,但是唐老以一人之力编成《全宋词》,接着又编成《词话丛编》《全金元词》,其艰难度可想而知。唐老的恩师吴梅先生为《全宋词》撰序云:“唐子此作,可谓为人所不敢为矣。”诚哉斯言!王季思先生评唐老业绩曰:“环顾海内词林,并世能有人?”我觉得即使说“并世仅有一人”也并不过分。唐老平生屡遭劫难,堪称东西南北之人,身体又很瘦弱,他竟能在既无经费支撑、又无团队协作的情况下毅然完成数部大书之编纂,这种大智大勇完全是源于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源于对国家民族文化事业的责任心,这是唐老公德之萃萃者。唐老为人和善温良,人称“唐菩萨”。但真正的菩萨都有金刚怒目的一面,唐老也不例外。反对轻易否定岳飞的《满江红》,称颂夏完淳而鄙视钱谦益,都是显例。李灵年回忆唐老谈到有人污蔑李清照人格时“怒不可遏”,这不是金刚怒目又是什么!唐老的公德也体现在其治学态度及待人接物各个

方面。例如20世纪60年代王仲闻先生参与订补《全宋词》,却因“右派”身份而未署名,唐老为他据理力争,中华书局的文书档案中保存着当年的《全宋词》出版合同,在编者签名的一栏里有唐老亲自用毛笔填写的“王仲闻订补”五字。又如70年代于北山先生撰写《陆游年谱》时曾向唐老请益,唐老回复了四封长信,或指示罕见资料,或商榷有关观点,倾箱倒篋,知无不言。又如80年代初刘庆云向唐老请教词话,当时《词话丛编》增订本尚未出版,唐老却把将要补人的25种书目先让她抄录。凡此种种,都在学界传为佳话。荀子云:“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辨。”用这几句话来概括唐老的学术精神,非常准确。一位视学术为天下之公器的学者,必然会以公心公德来从事所有的学术活动。

近年来学界经常举行缅怀前辈学者的纪念活动,8年前南京大学举办了纪念程千帆先生百年诞辰的大会,我在会上说:“我们今天纪念程先生,也是在纪念曾与程先生为道义之交、文字之交的所有老师,是当代学人对前辈学者的一次集体性的深切缅怀。”今天我缅怀唐老,便不由自主地想起唐老的道义之交与文字之交。程千帆、沈祖棻夫妇与唐老同出吴梅先生门下,他俩都与唐老交谊甚厚。抗战时期程先生陪沈先生到成都动手手术,一时无处栖身,唐老慨然把自己的宿舍让他们居住月余。沈先生作词有句云“万家清泪”,唐老指出“泪”字不宜单用,建议改用“悬”字,沈先生欣然照改。南师的另一位前辈段熙仲先生,比唐老还年长3岁。70年代有一次唐老因病不能到图书馆去,就托段老到南图看书时代查一条材料,段老欣然允诺。前辈学人“敬业乐群”的风度,令人倾佩。哲人虽远,典范长存。天下苦学风不正久矣!如今我们要想改良学风,回归传统,效法前辈应是不二法门。今天我们隆重纪念唐老,深情怀念唐老,其本质就是呼唤传统的回归,呼唤唐老以及唐老为道义之交、文字之交的前辈们所创造的风清气正的学术风气的回归。正是在这重意义上,我愿意对唐老说一声:魂兮归来!

枕边书系列之83 主持:宋庄

惟有书香最怡人

——顾之川谈枕边书

能谈谈您正在读的书吗?

顾之川:最近刚读完吕思勉《中国通史》,在读樊树志《国史十六讲》。这与我工作有关:一是在做一套《中国语文教育理论大系(1840—2020)》,二是为中国语文教育博物馆做文案策划。吕著《中国通史》长于综合研究,融会贯通,条理清晰,见解独到,尤以中华民族整体历史观,对待中西文化态度以及史料丰富见长;《国史十六讲》视野开阔,中西会通,生动有趣,有不少最新的历史学、考古学及人类学研究成果,这对我重新认识和思考中国语文教育史有很大启发。

您认为什么样的书更适合做枕边书?

顾之川:我理解的枕边书应是所谓“闲书”,跟自己的专业或工作没有多大关系。不一定有多大意义,但一定得有意思,耐读,有嚼头,而且充满生活情趣,好玩,让人心情愉悦,飘然入梦。枕边书也不能是高高讲章,否则容易让人浮想联翩,夜不能寐或者做噩梦。蔡元培为商务印书馆《读书指导》作序时,建议青年读三类书:一是便于自修的,二是便于参考的,三是便于增加常识的。夏可尊在《阅读什么》中建议中学生读三种书:一是关于自己的职务的,二是参考用的,三是关于趣味或修养的。枕边书应该是“便于增加常识”或“关于趣味或修养”一类的书。

近年来,您陆续出版《语文课程与考试论》《名师语文课》《顾之川语文人生随笔》(山东教育出版社),《语文工具论》《刘国正口述:教师·编辑·作家》(广西教育出版社)等作品,您从事语文教育研究几十年,能否谈谈您所理解的语文教育?什么样的语文教育是理想的?

顾之川:语文教育就是培养正确理解和熟练运用中华通用语言文字的一门课程。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努力学好中国语文。这既是责任,也是义务。语文学问关系着一个人的终身发展,社会整体语文素养关系着国家的软实力和文化自信。语文课有两个显著特点,一个是综合性,一个是实践性。语文教育当然首先要学习语文知识,培养读写能力,发展思辨能力,培养审美情趣,但最重要的还是学习如何运用,通过语言文字运用实践,积累语感经验,把握语言文字运用的特点和规律,培养热爱中华通用语言文字的思想感情和实际运用能力。理想的语文教育应该有助于提高运用中华通用语言文字水平,培育人文素养,厚植家国情怀,坚定文化自信,进而启智增慧,培根铸魂,立德树人。

几十年来,您专注于学问,倡导阅读,您如何看待当下学生的阅读?您认为阅读教学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顾之川:对于中小学生来说,阅读既是精神成长的需要,是接受教育的需要,更是学习语文的需要,学好语文也有助于学好其他学科。语文素养高的人,往往是喜爱读书而且确实读了很多书的人。一个人学识渊博,人们会说他“学富五车”“满腹经纶”“博览群书”,无不是称赞他读书多。这次语文教材改革,非常重视课外阅读。小学有“亲子共读”“快乐读书吧”,初中有“名著阅读”,高中有“整本书阅读”,就是要引导学生多读书,培养自主学习能力。我的地盘我做主,我的语文我做主。知识、才学不能由教师越俎代庖,正如好的食物,不能由他人代吃。正如《学记》所说:“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

您觉得怎样才能培养好的阅读习惯?

顾之川: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小时候背下来的课文,往往终身难忘,所以好的阅读习惯需要“从娃娃抓起”,让学生从小就能够“敬惜字纸”,感受到书香的神奇魅力。少年儿童求知欲强,对世界充满着好奇。要特别注意保护好他们的好奇心、想象力,允许异想天开,鼓励班门弄斧,敢于质疑书本,勇于挑战权威。杨绛先生说:“读书就好比到世界上最杰出的人家里去串门。要参见钦佩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者,不必事前打招呼求见,也不怕搅扰主人。翻开书本就闯入门,翻过几页就登堂入室。而且可以经常去,时刻去。如果不得要领,还可以不辞而别,或者另就高明,和他对质。”语文老师尤其是小学语文教师的引导点拨非常重要,应注意激发阅读兴趣,掌握阅读方法,养成阅读习惯。

很多时候我们会遇到这样的问题:知道是经典,也知道应该读,可是未见得合自己的兴趣。您遇到过这种情况吗?怎样才能耐得住性子读完一本好书,您有何建议?

顾之川:我也有过这种情况。比如,我曾试图读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大家公认这是一部魔幻现实主义代表作,甚至有人说是20世纪文学标杆,名气非常大。没想到我第一次只读了20多页就读不下去了。过了几天,心有不甘,又拿起来读,勉强读到50多页,最终还是放弃了。当我向一位在某著名高校教授当代文学的朋友说起时,他居然和我有同样的感觉。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我缺乏作品所描述的相关背景知识;二是所谓经典,其实有很多种类型,并不是所有的经典都适合所有的读者。人生苦短,我们只能读那些对自己口味的经典作品,否则只能“仰之弥高”。所以,我的建议是,当读不下去的时候,就放下,就像鲁迅说写作“写不出的时候不要硬写”一样。读书本来是一件很美妙、很让人期待兴奋的事情,何必为难自己呢?阅读的目的不在于充实提高自己,阅读经典作品也是这样,能够与自己产生共鸣,所谓“小叩则小鸣,大叩则大鸣”,这样的阅读才有意义。

怎样才能学好语文,您愿意谈谈自己的建议吗?

顾之川:要学好语文,我的建议是:读好三本书,写好两篇文章,养成四个好习惯。三本书指“有字之书”“无字之书”和“心灵之书”。“有字之书”包括课本、课外自读课本,还有课外读物。“无字之书”就是社会生活实践。“心灵之书”既包括书本上的,如文学作品中的人情冷暖、爱恨情仇,也包括现实生活中的世间万象、真善美与假恶丑。就是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知行合一,把书本学习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不能学那些“书呆子”或“两脚书橱”,除了读书一无所长。两篇文章指短文和放胆文。规矩文重在打基础,重在“保底”,要求练好写作基本功,掌握各种文体基本规范。放胆文更能见才气,鼓励放飞自我,大胆想象,各呈创意,各展所长,充分表现自己的应用写作能力、语言表达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和辩证性思维能力。四个好习惯指享受阅读的习惯、善于思考的习惯、乐于表达的习惯和自主学习的习惯。

哪些书是您反复阅读的?谈谈您的读书方法?

顾之川:作为语文教育工作者,我读得最多的还是语文名家大师的论著,如叶圣陶、吕叔相、张志公、刘国正、于漪等人的著作,尤其是语文教材、语文教育史方面的论著。至于读书方法,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法。诸葛亮“独观其大略”,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杜甫是“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苏轼是“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精思子自知”,朱熹讲究“逐句玩味,反复精详”。我读书,一是采取“拿来主义”,挑选、占有、运用。只选自己感兴趣的,或者自认为有价值的,能够为我所用的,才阅读。否则,好书那么多,哪能读得多?“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二是“雁过留痕”,既然要读,就要力求有所得,尽量多得。遵照“不动笔墨不读书”的古训,把自己认为重点字词、精彩句段圈点勾画,估计将来写作时用得上的内容或观点作特别标记。三是“随心所欲”法,喜欢的就多读几遍,感觉一般的大致浏览一下即可。至于那些一读就感觉索然无味的,没什么意思的,随便翻翻即可,即使如黄侃所讥“煞书头”也不必在意。

如果您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顾之川:如果只带三本,而且是无人荒岛,我会选《论语》《叶圣陶吕叔相张志公语文教育名篇精选》和汤因比《历史研究》。《论语》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也是中国人的人生教科书。《叶圣陶吕叔相张志公语文教育名篇精选》是作为“语文三老”的代表性作品,作为语文人,可以从其中汲取精神滋养与前行动力。汤因比《历史研究》则有助于开阔视野,会通中外,能够提供独特视角和别样思路。

假设您正在策划一场宴会,可以邀请在世或已故作家出席,您会邀请谁?

顾之川:我阅读文学作品非常有限,当代作品读得不多,外国作品就更少得可怜。假如让我主持这场宴会,人少了没气氛,多了坐不下,不妨请以下10位吧:庄子、陶渊明、苏轼、吴承恩、鲁迅、汪曾祺、路遥、麦家、莎士比亚、安徒生。话虽如此,谁知道他们肯不肯赏光呢?

酒事江湖 83 主持:丁帆

壶里乾坤,杯中雅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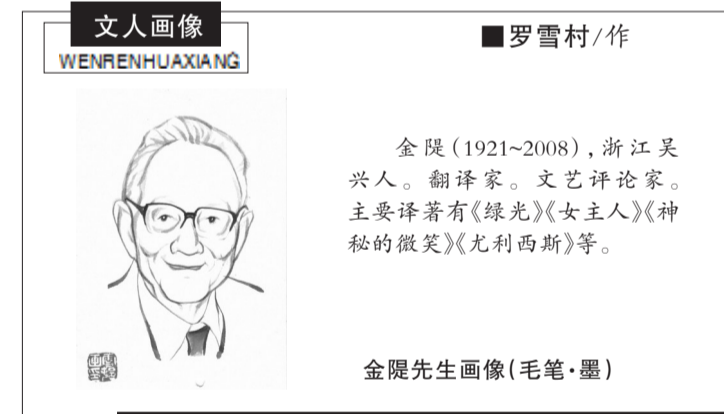
■杨九论

“上帝造水,人类造酒。”这是维克多·雨果的一句名言。人是酒的造物主,这决定着酒一开始就是文化。酒并非必需品,但并不天然地排在必需品之后,就像吃好排在吃饱之后一样。贫困潦倒而嗜酒如命者并不少见,唤作“酒鬼”就有这么“好”。电影《伤城》里金城武扮演的丘建邦问:“酒有什么好喝的?”梁朝伟扮演的刘正熙答曰:“酒好喝,是因为它难喝。”“难喝”,可见饮酒原非人的天性,迥异于人之上帝所造之水。“难喝”而又“好喝”,要非文化,不可详得其解矣。

“说不尽的酒文化”,不只是源远流长,也是因为横无际涯。套用法学的术语,酒不是“部门法”,不存在相对独立的边界;而是“领域法”,点点滴滴,渗透在不同的领域。“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唐·白居易)“花落一杯酒,月明千里心。”(宋·郑思肖)人们一提到酒文化,往往就会想到文人笔下的佳词丽句,怕是偏颇太过。如果一定要将酒与文人看做关联变量的话,那么今天的社会要么酒与文人罕匹,要么酒与文人罕见。经由文字符号筛选,保全下来的传统文化远远不能反映古代的社会生活。诗人洛夫曾说:“要是把唐诗拿去压榨,至少会滴出半斤酒来。”与其说酒带来了诗,不如说诗记载着酒。尽管如此,在俗文学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浸湿在民间的斑斑酒渍,《水浒传》中回回有酒,即是其证。“酒肉弟兄千个有,落难中无一人。”(明·冯梦龙《古今小说》)更是道尽人间百态。《隋唐演义》:“自古道:‘诗为酒友,酒是色媒。’”“酒则被分在‘诗友’与‘色媒’不同领域。作为‘领域法’的酒文化,放到我们之所能见,生意场上,

名利圈中,人情世故,酒穿行其间,长袖善舞,所谓俯首即拾,倒也犯不着繁琐论证。酒文化之斑驳,即人间世之斑驳,说不清也说不尽。

文化,并不等于文明。酒场上,不文明的现象怕是谁都见识过,但“酒文化”常常成为通词甚至辩词。2020年一银行新员工拒绝喝酒被领导掌握,引发坊间久久热议。其间在指责领导的同时以“酒文化”批评员工“不懂事”的言论,亦不在少数。老实说,要求文明饮酒似也未太过,但饮酒不能不文明恐怕还是要讲的。前者是积极文明,后者是消极文明。让饮酒带有一些消极美学的气质,不亦宜乎?但是,“一杯下肚,轻言细语;两杯下肚,甜言蜜语;三杯下肚,豪言壮语;四杯下肚,胡言乱语。”可见,真的喝起来,消极文明实在是在极难把控的事儿。“诗为酒友,酒是色媒”,好像一个大雅一个大俗,但在《隋唐演义》的两个东官官那儿,前者自然过渡到后者,共同构成了及时行乐的语境。(增广《贤文》)有云:“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后两句是前两句的反转,在“相识满天下”中又何尝少得了吟诗饮酒呢?浙江大学的王俊有一篇《醉酒现象学》的论文,认为醉酒能够将人的精神推至“绽出”状态,具有批判性特征。该文所论乃哲思一途,醉酒现象更大程度上是隐喻性的,就像作者引述的尼采的酒神精神一样。设若及至更广泛的领域,醉酒可能有致人于本真状态之“绽放”与“敞开”,但更多的可能是致人于非本真状态之“沉沦在世”(海德格尔语)。扬州八怪之一金农撰有楹联:“饮量止于醉,雅怀乃游乎仙。”此番陶次,能不心向往之?但倒也不必孜孜矻矻于前者。如果后者有消极文明衬底,饮酒的市井气、烟火味也不让人流连



牵挂吗?《论语·乡党》:“惟酒无量,不及乱。”酒尽管喝,不乱德就行,这就是消极文明。孔子的话,甚得人心。

俗话有云:“一人不喝酒,二人不打牌。”“二人不打牌”,是因为只有两人的话,对方手上的牌即可直接推得。“一人不喝酒”,是因为共饮是喝酒的基本形态。“一人喝酒”被称为“喝闷酒”。可以说,对话,是酒文化展开的话语机制。陶渊明《饮酒》:“一觴虽独进,杯尽壶自倾。”“虽”字一转,道出“独进”乃非常态。李白更有《月下独酌》:“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从“独酌无相亲”到“对影成三人”,以拟想的共饮构成了一个自我对话的妙绝场景。写独酌的诗什,背后大多都有对酌衬着。至于相与共饮的诗句,可谓目不暇接:“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唐·王维)“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唐·杜甫)不过这些都是文人的清词雅趣。酒文化的对话机制,作为“领域法”的蔓衍,真可谓道不尽的人间百味,写不完的人间百态。马克思曾说,作为使用价值的桌子,就是“普通的可以感觉的物”,但一旦作为交换价值,桌子就会“用头倒立着,从它的脑袋里生出比它自动跳舞还奇怪得多的狂想”。没有酒的桌子,就是日常餐饮,比如工作餐,到点吃饭,吃啥就行,典型的使用价值。桌子上一旦备上酒水,话语机制也就启动了。所谓“无酒不成席”,酒席既布,吃饭的使用价值便偏就一边,不同行人的规则、人际关系,其交换价值也就

粉墨登场了。酒的话语机制,对原有各个领域的规则以及特定人际关系,进行了一次萃取与重塑,然后在酒席上再语境化,从而构成了“饭局”。所谓的萃取与重塑,就是一套游戏化、边缘化、非正式化的修辞策略。趣味盎然在此,心机巧然也在此,两者相互纠缠很难遽然搞清。“筷子一伸,上下不分;酒杯一端,政策放宽。”“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只要感情有,啥喝都是酒。”“喝一半,情不断。”没有逻辑,经不起推敲吧?这不重要,因为本就不须推敲。重要的是,平时不宜说的以及一时找不到切口的话,便可能找到机会。才建立的关系,也可能加热升温。借助情境化的因缘达成正式的因果,借助边缘化进入中心,借助游戏化对权力关系(中性词,并不必然是贬义)进行了一次重新整理与叙事。但是,有一点,修辞是修辞,原有的语法还在那儿,修辞是为语法服务的。错会于此,游戏就有可能结束,“饭局”的“局”也可能不欢而散了。

云云种种的酒席饭局,实在是很好的社会学议题,似乎不必生沽癖而讳言。福柯有言:“话语即权力。”因为酒的话语机制,我们要说,“酒即权力”。这也是饭局多陋习的根源所在。所以说,消极文明衬底,在这儿确乎十分的要紧。古人云“酒逢知己千杯少”,现在却是“酒逢千杯知己少”。虽不必拿前者强扭后者,但若若能保持两者之间自如调频,既不必薄薄称梁,更能变敬古重,大雅大俗之间,不亦生民之自在福田乎?